

挨了一顿骂 反而解脱了

——一位基层干部的内心独白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洪波 廖雯颖

10月23日,齐鲁大讲坛,以“敢说”和“给官员上政治课”闻名的于建嵘教授讲得激情澎湃。台下,众多听众之中坐着专门从河北南宫赶来的傅学磊——他是南宫(县级市)市委常委、办公室主任。跟他一起来“找骂”的还有他老家河北临西县的三名乡镇长。

听于教授“骂”完了,一直强忍着膀胱冲击的傅学磊急忙冲向厕所,他长出了一口气,感觉有一种解脱。“我们属于于教授批评的对象,但他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,他也为基层干部说了话,没把责任全推到我们这些人身上。”

当基层干部真很难

傅学磊没想到,他的这一次偶然来外省听于建嵘讲座的经历,会让他成为被采访对象。

所以,24日晚上,当记者提出想采访他时,傅学磊犹豫了好一会,发回一条短信:“我想我可以为您讲一些来自县乡村的故事,但正像于建嵘教授所说,我们目前是最经不起媒体曝光的群体……”

10月27日,在南宫市,料峭的寒风中,36岁的傅学磊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,是客气、成熟而又谨慎。

来南宫之前,傅学磊在临西县老官寨乡当乡长,“做基层干部真的很难,特别难。”他反复说。

傅学磊说,他当乡长时,临西有个造纸厂,废水直排到下面一个村,环村半周,棉花也不长了。先是村民上访,但这个造纸厂是县里当时的纳税大户,废水还在排。后来,在一个大雨天,几百个村民冲进造纸厂,把电网给拉了。

傅学磊赶到厂里。村民答应派几个代表,下午在村里跟着烧饼,开着吉普车,带着几个人进村了。这一次,他们被村民围住了,车胎也被扎了。

傅学磊知道村民眼急了,就有可能打人,或者挑唆个醉汉出来打人,被打了还没处讨说法是次要的,但他这个乡长的威信如果没了,以后的工作可就没法干了。

晚上9点多,傅学磊冲出了重围,他临走时告诉村民,明天一早他回来,没拉(说,编者注)开的事接着拉。

“第二天不能不去,不去就是怕了,那村民就看不起你这个乡长了,所以我第二天一大早也就进村了,不光为了表明诚意,也是因为一早村民都上地了,人少,而且没有喝醉的。”傅学磊很无奈地说,“因为县里已经给我们下了命令,要无条件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傅学磊说他当乡长时,很佩服他10岁的乡党委书记,因为他在处理基层问题时很有办法。

老书记曾经给他们在村里的工作“不能动硬的”对象总结了三类人:家里有关系的;家里太穷的;家里有老人、病人的。根据这个原则,他们果然也没出什么大事。

2006年,邢台公开选拔十名副县级干部,傅学磊准备去考。那时正值村支“两委”换届,几个村上访不断,傅学磊说他为此守了两个星期。为了不耽误学习,他把手提电脑搬到办公室,一边上网查资料学习,一边给人做工作,甚至说出请上访代表“帮忙”的话:“你看我现在都没时间复习了……”

一股看不见的怨气

傅学磊曾经在博客上发过一篇文章(《实话也许逆耳》)太原禁止进京上访有其合理性。他说,那些仅仅是受了欺负,受了委屈而没有其他目的的农民,是不会越级上访,缠访的,“也许是没有那个意识,也许是因为窝囊、害怕。”

当记者问他,这些真正受了委屈的“老实人”如果不站出来,政府会不会注意到他们时,傅学磊沉默半晌:“不会,乡里的财力太差。”

傅学磊也常常在想,为什么不断有老百姓上访,为什么基层关系老理不顺:“农民心里有一股怨气,觉得自己吃了很多亏,但到底哪里吃亏了,吃了多少亏,农民不清楚,我也不很清楚,但吃亏的感觉很真实,很明确。”

傅学磊说,他在老家群众基础还比较好。但他逢年过节和在外工作,经商的同村人一回村,老家人也许会问:“你看,他在外边工作就有车开,还有酒喝,我为什么不能?”

傅学磊说,他也是农村出身,有时候能切身体会到那种感觉,“城市里高楼大厦修起来了,有了大马路,汽车,甚至地铁,可农民有什么?甚至连修条路也要集资。他们就会想,‘城市人肯定是沾光了,我肯定是吃亏了,所以我要回来。’”

“而老百姓不断上访,可能就是因为这股想不清,看不见的怨气生出来的。”傅学磊甚至认为,“等到农民真弄清楚了,哪里吃亏了,怨气会更大,正常和非正常的诉求会更多,情况会更加不好处理。”

有时存在的书生气

“我有时候感觉很无奈,我也做过一些过分的事,但不这样,工作就没法推行下去。”傅学磊叹了口气:“没办法,就那么一种环境……”

说这话时,他的神情有些黯然。

2006年3月,邢台全市招考10名副县级干部,考试中的申论题,是农村绳油村事件,关于失地农民的课题,傅学磊回答的标题是《利益分化中呼唤权益伸张》,中间批评了政府及相应政策。他说当时下了个赌注:“如果是领导干部阅卷,我宁可选不上,肯定是这个干部政治上不成熟,不能用;但如果专家学者阅卷,我就可能得高分。”

最后的结果是,傅学磊考上了,笔试分比较高。

有一次,傅学磊看到报纸上登了一个慈善家的事迹,他满怀希望地给三位慈善家每人写了一封信,用的是老家寨乡乡长的名义,希望老人们因家有大学生而形成的贫困户能得到帮助,可信如石沉大海,他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回音。

“这种比较幼稚、比较书生气的事情,只能悄悄地做,如果公开做那就是傻子了。”事后,

傅学磊悄悄嘱咐知道这件事的人,不要说出去。

有时候,傅学磊也会做些“违背原则”的事,比如有的工程损害了庄稼,污染了环境,他会以乡长的身份把对方的项目经理叫来,然后让老百姓围住他,要钱。“只要能找出理由来,就让他赔些钱,工程不缺钱,可老百姓缺钱。”这些问题属于于建嵘教授讲的“人民内部矛盾”——能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。

傅学磊还曾在博客上发表过《农民的缺位是网络媒体最大的缺失——兼问新华网博客能否率先为农民安家》,私下里,他却也有些担心,“有一天农民全部或大部分上了网,那就很难控制了。”

如今,他经常会说一些心里话,自相矛盾的语,隐晦地骂人也会招来网友骂的实名博客,已经接近停顿了。

我得到了一些解脱

这次来济南听于建嵘教授讲座的想法,起源于傅学磊博客中转载的一篇《县政改革请自改变》异地为官“始”,虽然那时候,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于建嵘是何许人。

后来,他看齐鲁晚报得知于建嵘要在济南讲课,就想来听,但为此事他也酝酿了好一阵儿,他没敢喊现在的同事,毕竟于建嵘是以“骂官员”著名,“即使同事只是稍微一犹豫,我也会觉得自己很尴尬。”

最后,他拉着三位临西县的老同事、老同学去了。这点大家很赞同,因为“乡镇干部不能坐井观天,也要听听教授的讲座,了解一下国家形势。”

“于教授不是说我,假如要搞拆迁,让我们千万不要冲在最前面。”傅学磊还清楚记得于建嵘那时说话的样子——“假如为这个事老百姓把你给打死了,你就白死,没有人敢把你迫为烈士。因为只要进了,全国网民会把你骂死的。”

当时底下人纷纷笑了,傅学磊也觉得百感交集。

“上面任务压着,下面老百姓顶着,基层干部夹在中间,无比尴尬。”傅学磊说。

在于建嵘犀利讲课中,傅学磊突然感觉自己有一点解脱。“于教授也说了,很多事情不能怨基层干部,他没把责任全推到我们身上。”

虽然,傅学磊也并不同意于建嵘的一些说法,“但是,我理解他为底层说话的想法。”傅学磊说,讲座结束后,他就像流星一样,与大家挤在一起请于教授签名,并且他还给予于建嵘留了纸条,邀请他“到南宫调研,并给予面对面的指导。”

傅学磊经常在很多场合重复季羡林的一句话:“什么事是好人,就是做好事比做坏事多,什么是坏人,就是做坏事比做好事多。”

他说,这句话应该能让很多人心理找到平衡,得到解脱。



傅学磊接受采访。



套中人。



范桂兰和学生们在上课。

49岁小学生撩起的波澜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纪珍

听说范桂兰去上学了,村主任范崇伟偷偷在心里估算了一下,村里800来户人家,2300多口人,不识字的可能也有上百个人。

或许,像范桂兰这样的农民,已经成为中国最后一代不识字的人了。以前不识字,他们也过来了,但现在,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里,因为一个46岁农妇的勇气,人们开始重新审视“识字”这个问题。

“这时候起风了,蜜蜂飞得很低,几乎要触到地面……”10月21日,莒南县筵宾镇范家水磨村小学三年级一班的教室里,传出琅琅书声。

49岁的范桂兰,坐在孙子辈的小同学中间,跟着他们小声朗读。为了圆一个识字的梦,从2006年至今,农妇范桂兰已经上了四年小学了。

如果没有选择上学,或许范桂兰会和村里很多五六十岁的妇女一样,成为新中国最后一代不识字的人。可如今,这位农妇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

上学第一天

手抖得拿不住笔

2006年9月4日那天早晨,46岁的范桂兰挎着书包走出家门的时候,头都没敢抬。她像做贼一样,慌慌张张却又满心兴奋地走向村里的小学。

范桂兰的家离学校也就2分钟的路,但范桂兰没想到,直到46岁时,她才真正走上这条路。

范家水磨村是范桂兰的娘家。11年前,她和丈夫从县城又回到这里做饲料生意,家里还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,现在已是村里无人不知的“有钱人”。

上学第一天,教室里那些七八岁的孩子,不时回头好奇地看范桂兰。

而范桂兰一直低着头趴在桌上,紧张、激动、害羞,以致于手都哆嗦得拿不住铅笔。

识字不识字

活得就是不一样

语文老师范凤菊从一年级就教范桂兰,在她眼里,范桂兰是班里最刻苦的学生,范凤菊回忆说,刚开始学拼音,范桂兰的舌头转不过弯来,她就反复念,一个拼音念几百遍。

“都学迷了。”范桂兰的丈夫李洪海说,范桂兰吃饭时都拿着筷子在饭桌上写写画画,睡觉前要看书,睡着了嘴里还念着拼音。

苦学很快有了结果。上学不到一个月,范桂兰就能试着用手机拼音法写短信了。第一条短信,她发给了远在洛阳上大学的儿子,内容她还记得:“儿子,你在哪里?我也会发短信了……”

“识字和不识字,活得就是不一样。”范桂兰觉得人生改变了,她从一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村妇女,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了。

留了两级

仍上三年级

尽管已经上了四四年级,但范桂兰还是不好意思单独大声朗读课文。年龄大了,普通话说不太好,范桂兰总是小声地随着同学念。

范桂兰是个偏科的学生,她说,她最喜欢语文课,就是爱认字,爱写字,对数学的爱好稍差一些,三年级以后有了英语,但对近年上百的范桂兰来说,英语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,今年本该上五年级的范桂兰,留了两级,仍然上三年级。

范桂兰的同桌邢春晓今年10岁,和范桂兰同村,按辈分得管范桂兰叫姑奶奶。就是语文老师范凤菊,也得叫范桂兰姑奶奶。

装在“套子”里的人

一个姓名造假者的“八年抗战”

本报记者 鲁超国 王恒

张守礼到大学报到时,是卖给他分数的赵伟东带着他去的。一切交接顺利后,真的赵伟东走了,张守礼变成了“赵伟东”。

进看守所之前,他媳妇刚刚怀孕两个月,以前两个人还曾商量如何给孩子起名字,他们都坚决反对姓“赵”,然而姓父亲的真姓似乎也不合适,最好的办法就是跟随母姓。

“张守礼!”当别人如此称呼他时,他的反应先是一怔,然后才会应承,这是一个久远的名字,熟悉而陌生。

他早已习惯别人称呼他为“赵伟东”,这个用了8年的名字,跟随他上大学、工作、买房、结婚……

近日,淄博周村区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,将他那个光耀的身份剥去,从“赵伟东”变回了只有“高中文化程度”而且带有“缓刑”污点的张守礼。

8年前,他冒名顶替别人上了大学,更名改姓,变成一名“复制人”,他时担心这份光鲜的“外套”被人脱下,但是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只是,被脱下之后,他反而感觉轻松了……

那么,这件复制的“外套”,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?

为了上大学

1983年的一个冬天,张守礼降生在鲁西南的一个贫穷乡村。

他在家排行老七,上面有6个姐姐,最大的比他大15岁。

终于生了个“带把”的,为祖宗续上了“香火”,父亲笑了,尽管因超生已经被罚得家徒四壁。

张守礼降生后就成了家里的“掌中宝”,父亲给他取了个小名叫“大宝”。

6个姐姐没有一个上到高中的,他们举全家之力供张守礼上学。

然而,在张守礼的记忆里,他的少年时光生活并不轻松,家里穷,靠种的几亩菜地为生,他常常择菜至半夜,第二天一早去集上卖。

2002年,高考成绩出来了,张守礼考了470多分,只能报个专科学校。

张守礼闷闷不乐,有一天,父亲问他:“你想不想上个好点的学校,本科。”

“当然了,谁不想啊。”张守礼那时候还是个单纯的孩子。

父亲通过一个老师做介绍,花了3500元,买了一个“考上不想上”的“三本”名额。考生的名字叫赵伟东。

张守礼还不知道改名换姓今后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,他没有想那么多,他只知道:在农村,上学是唯一出路。

“三本”的学费很高,每年1万多。

张守礼上高二时,其父亲已经查出患有肺病,看病花了将近两万。

张守礼的学费,基本上是靠把家里的二三十棵树木卖了之后换来的。

双重身份

张守礼到大学报到时,是卖给他分数的赵伟东带着他去的。一切交接顺利后,真的赵伟东走了,张守礼变成了“赵伟东”。

当老师第一次点名的时候,他生怕错过了自己,当点到“赵伟东”这个名字时,他急促答“到”。

但是,平时同学们叫他时,有时喊他三遍他都没反应,同学怀疑他耳聋。

后来,他渐渐适应了“赵伟东”这个名字,渐渐达到了“人合名一”的程度。

他在学校表现突出,学习成绩优异,乐于助人,和老师、同学关系融洽,因此,他被选为班团支书,还参加了学校勤工俭学护校队,并担任队长。

他办理了“赵伟东”的二代身份证,之后还考了驾驶证。他和同学过身份证上的生日,然后,再和家人过“大宝”的生日。“大宝”要比“赵伟东”小两岁。

之后很多年,很少有人称呼他张守礼这个名字了,除了偶尔联系的初中和高中同学。

大三时,他恋爱了,他不让女友喊自己“赵伟东”,而是让她称呼自己的小名——大宝。

刚开始女友不知理由,后来他如实地相告。

远去的自我

(应当事人要求,本文均用化名)